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

〔日〕福泽谕吉 著
王 桂 主译
陈 榴 校



21210376

人民教育出版社

i210376

本书根据日本明治图书出版株式会社出版的《世界教育名著选·福泽谕吉教育论集》选译，在选材上还参考了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福泽谕吉全集》。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
福泽谕吉教育论著选

〔日〕福泽谕吉 著

王 桂 主译

陈 榴 校

《丛书》责任编辑 肖云瑞

本书责任编辑 邹海燕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48,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630

平装本 ISBN 7-107-10738-0/G·2068 定价：3.90 元

精装本 ISBN 7-107-10739-9/G·2069 定价：6.60 元

《外国教育名著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不仅需要研究我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总结我国教育的经验，而且需要研究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为了给我国教育工作者提供研究外国教育思想的理论著作，并给师范院校提供教学参考书，我社决定出版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选收古代、近代、现代对世界、对中国有较大影响的外国教育家、心理学家的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整本专著、文章汇编或者著作节选。

毋庸置疑，本丛书所收选的书既闪耀着人类教育智慧的光辉，又由于作者所处时代、阶级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有的虽非糟粕，但由于地区条件的不同，也可能并不适合于我国。因此，我们在阅读时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对书中的内容进行分析，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而不要照搬照抄。

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和理解书的内容，我们请译者或有关专家为每一本书撰写了前言，有的书还附有年表、图片或其他参考资料。当然，前言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对某书的定评；读者完全可以对这本书进行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本丛书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进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福泽谕吉及其教育思想评介

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他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积极批判日本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宣传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有“日本伏尔泰”之称。

一、时代、生平、著述及教育活动

福泽谕吉所生活的时代——19世纪后半期，正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巨大转变时代。当时，一方面，以德川幕府的将军、大名(藩主)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不断增长。因此，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沉重地打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幕藩体制越来越没落，趋于瓦解。正在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目标指向了日本。1853年美国舰队首次敲开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外来的侵略严重地威胁着日本国家的独立。在这样的社会基本矛盾和民族危机情况下，1868年日本发生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明治维新。广大人民群众在下级武士的领导下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明治政府。明治政府建立后用了十几年

的时间，自上而下地实行了一系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但是，旧的封建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仍然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新旧交替、斗争尖锐而复杂的时刻，福泽谕吉以谋求国家独立和“富国强兵”为己任，作为日本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登上了历史舞台。

1835年1月10日，福泽谕吉生于日本大阪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藩^①的总管，被藩主派到大阪的“货栈”^②长期值勤，因此全家都迁居大阪。母亲阿顺是出身于本藩一个士族家庭的有教养的妇女。这对夫妇共有五个子女，谕吉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父亲酷爱汉学，善长经学诗文，是位很有才学的人。但由于受封建社会等级身分制度的限制，终生不得志，空怀不平，年仅45岁便抑郁而死。父亲死后，母亲带领五个年幼的孩子迁回故乡中津。因家境贫寒，母亲无力顾及子女的教育，所以福泽谕吉入学很晚，13岁时才入村塾。他一边学习汉文书籍，一边做一些手工业的杂活以维持生活，饱尝了下级武士生活的艰辛与苦楚。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反封建的种子，使他认识到“门阀制度是父亲的死敌”。^③

福泽谕吉在19岁以前学习汉学，用了四五年时间，通读《四书》《五经》并自学历史，基本上成了一个小小的汉学家。但他并不信奉封建伦理道德，对封建等级身分制度颇为不满。他期望有朝一日离开中津，到外地去探求新鲜知识。1854年2月，他的愿望终

① 丰前是九州地区的一“国”。中津在大分县的西北部，1732—1869年为奥平氏之领地。藩是诸侯的领地。

② 江户幕府时代各藩的诸侯为了满足生活和财政上的需要，把榨取来的年贡米和其他贡品卖掉，以换取货币。所以各地诸侯在江户或大阪设有为本藩贮藏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仓库。

③ 《福泽谕吉自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于得到实现。为了学习兰学^①，他在哥哥的支持下决定去长崎。到了长崎，他边学习荷兰文，边学习西洋炮术。虽然他没有见过铸铁炮，可是由于他聪慧机敏，很快就掌握了绘图和写说明的本领。他在学业上的显著进步遭到了中津藩家老^②的儿子奥平壹岐的嫉妒。他以福泽谕吉母亲有病为理由，想把他召回中津。堂兄写信把实情告诉了谕吉。他得知奥平搞的鬼把戏后愤懑至极，但又不能直接抗拒。于是，他表面上装着回中津的样子向奥平壹岐告别，实际上，他取道下关，再乘船去大阪。这是1855年2月的事情，距他离开中津整整一年。

哥哥三之助继承父职，当时在大阪中津藩的货栈工作。三之助听完谕吉的说明后，劝他留在大阪学习兰学，并向他推荐绪方洪庵（1810—1863）的适塾（也叫适塾）。洪庵是备中国（今冈山县）足守藩藩士之子，曾在大阪、江户、长崎等地学过兰学，翻译过生理学、病理学、内科、霍乱等医书，是位有名的兰医学家。他还是位优秀的学者、教育家，在大阪过书町（今天的东区北滨三丁目）创办了私塾，云集了来自全国的兰学生。1855年3月，福泽谕吉在《适塾名簿》上注册登记，成为绪方洪庵的门生，正式开始学习兰学。如遇良师和勤奋好学的学友，使福泽谕吉的学业突飞猛进。可是，不到一年，新的苦难又向他袭来。1856年2月福泽在护理同学时感染上了伤寒病。身体康复后不久，哥哥又病故了。按日本的风俗习惯，该轮到他回福泽家当家长，可他决不愿意在中津当个看家奴，而希望好好学习，做个有才干的人。他毅然决然地说服了母亲，变卖了家产，安排了家事，回到大阪继续学习。在这里他专心致志地阅读荷兰文的物理学和医学书籍，培植了无神论思想和憎恶儒学的感情。

① 指江户时代中期以来学荷兰语或借助荷文著作研究西洋学术的学问。

② “家老”是江户幕府时代大名的重臣。大名去江户时，留守藩内执掌藩政。

正当福泽谕吉在适塾勤奋学习的时候，中津藩决定在江户藩邸设立一所兰学塾，并邀请福泽谕吉任教。1858年10月下旬，他奉藩命赴江户，在筑地铁炮洲开设学塾，讲授兰学。这就是“庆应义塾”的起源。在宣讲兰学和接触外国人的过程中，他产生了学习英语和去西方考察的念头。1860年1月，幕府决定派遣一个全权使节团赴美，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批准书。日本为了学习航海技术，乘此机会派“咸临丸”以保护使节团的名义，随美国军舰一起横渡太平洋。“咸临丸”的舰长是幕府“军舰奉行”（长官）木村摄津守，经别人推荐和亲自拜求，福泽谕吉作为木村的一名随员也登上了“咸临丸”，加入了渡美行列中。这次出访历时五个多月，他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耳濡目染，深受其影响。在旧金山访问的五十多天里，他着重考察美国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况，深切感到资本主义的美国与封建社会的日本大不相同，具有先进的文明，值得日本学习。在这里他看清了文明发展的方向，坚定了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方文明的立场。归国后，他一方面继续在江户的学塾里执教，由传授兰学改为向塾生教授英文；另一方面，他不顾攘夷派的反对，致力于摄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接受幕府“外国方”（相当于外务省）的聘任，从事翻译英、美各国公使致幕府的外交文书的工作。这项工作对他的学习很有利，使他可以自由阅读外务省的图书。

1861年临近年末时，幕府决定派出一个遣欧使团，其任务是同欧洲五个国家商谈1858年缔结的延期开放港口条约事宜。这次出使的人员有40人，福泽谕吉被任命为官员，作为随团翻译出访。使团一行从1862年1月1日起程，到12月10日返回日本，历时一载，访问了法国、英国、荷兰、德国、俄国、葡萄牙等六国首都。这次旅欧，福泽谕吉收获极大。同旅美时一样，他所关心的主要是欧洲的政风人情和有关社会问题。“例如在欧洲有所谓医院这种设施，然

而它的开支怎样解决？由谁负担？还有所谓银行这种机构，它的金钱收入与支付如何办理？邮政法也在实行，然而该法的旨趣如何？法国实行征兵制，而英国没有颁布征兵令，那么征兵令的目的究竟何在？”^①对这些问题，福泽谕吉都想弄个明白。通过这次旅欧，福泽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明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懂得了封建社会的日本应如何对待来自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冲击。他说：“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洋文化教育”^②。这种“教育救国”思想成为他后来致力于著述和教育事业、宣传“文明开化”思想、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

福泽谕吉访欧归来后的 1863 年，尊王攘夷运动已发展为倒幕运动，“攘夷论”大为盛行。长州藩是尊王攘夷派的总根据地，1863 年 6 月 25 日，长州藩在下关海峡炮击了外国船只。此后，萨摩藩也向英国军舰开了炮。西方侵略者随即疯狂地进行报复。1864 年 9 月，英、美、法、荷联合舰队向下关进攻。同时，幕府下令诸藩征讨长州。长州藩在内外夹击下被迫屈服，保守势力复辟掌权。经过这场流血斗争，以长州藩倒幕志士为首的尊王攘夷派觉醒到，单纯地排外、攘夷是行不通的，要攘夷就必须先打倒幕府，实行“开港讨幕”。1865 年长州藩的维新志士再度起兵，打败长州藩的保守势力，重新掌握政权。长州藩再次成为“倒幕”的据点。其后，倒幕势力发展壮大，倒幕舆论高涨起来。对此，幕府非常害怕，1866 年 7 月以“暴徒再起”、“私购军火”、“私自对外贸易”等理由，悍然挑起第二次征长战争。这次不得人心的“讨伐”，一出师就遇阻。萨摩藩拒绝出兵，佐幕诸藩中也有很多人反对。英国政府最初支持幕府，现在也改变了政策，转向支持倒幕势力；美国因忙于南北战争而无力干预日本；只有法国支持幕府，试图插入统治之手。在这种

① 《福泽谕吉自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113 页。

② 《福泽谕吉全集》，日文版，第 16 卷，第 209 页。

国内外局势下，以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力量，利用英法矛盾，实现萨长结盟，并武装了民众，打败了幕府军。

面对当时激烈而尖锐的斗争形势，福泽谕吉没有直接参与这种政治之争。他把“文明开化”、“社会变革”的期望寄托在幕府这一边，企图在幕府的领导下进行“文明开化”的启蒙教育。例如，在第二次出国赴欧的旅途中，他和同伴谈起自己的抱负时说：“我希望每年净领二百包大米，去做将军的老师，按照自己所想的向将军灌输文明开港的道理，以指导他进行一次大的变革。”^①访欧归来，他仍然受聘于幕府，专门从事翻译外交文书工作，有时还根据自己的文明观向幕府陈述对政情的看法。当时，福泽谕吉虽然“非常讨厌幕府在门阀制度上的压制和锁国主张，因此无心为它效力”^②，但是他对幕府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方面，他对尊王攘夷的维新志士怀有偏见，毫无好感，认为他们是头脑发热、目光短浅的“攘夷”之徒，更无心帮助他们。因此，他在明治维新前夕主观上是想“做将军的老师”，很好地宣传文明开化思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指导幕府进行一次大的变革。然而事实上他却站到了尊王攘夷派的敌人一边。

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即1867年正月，福泽谕吉第三次出国。这次是幕府决定派遣使节去美国取军舰，福泽自己要求作为一名翻译而同行的。因为他了解西洋情况，便负责办理出国手续等。1867年6月末回到日本后不久，他被幕府“外国奉行”给予“谨慎”处分，历时三月余。给他处分的原因好象有两条：其一是他与赴美使节团委员长小野友五郎之间发生了冲突，招致上司的反感。其二是他本人大量购买图书，引起上司的不满，说这是和福泽的身分不相称的随意采购。实际上，他买回的图书，不久便在他主持的学塾中

① 《福泽谕吉自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6页。

② 同上书，第157页。

作为教材使用,没有什么不妥。从此以后,他对幕府逐渐改变了看法,越来越看清幕府的腐败无能,根本担负不起救国救民振兴日本的重任。他在第三次出国赴美访问的归途中,与同行的一位朋友谈起日本的政治形势时忧心忡忡地说:“看一下今天的幕府政治吧!”“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作呕的政府”,“追究他的实意,就会看出幕府就是攘夷论者的魁首”,“这样的政府,把它铲除掉还不好吗?”^①福泽这时虽已预见德川幕府快要垮台,应该把它打倒,但由谁来打倒呢?他感到迷茫、困惑和忧虑。他对长州、萨摩藩的维新志士仍然误解很深,认为那些倒幕派“一旦掌权也不并不比幕府好,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当今的幕府继续执政”。^②因此,他在风云激荡的倒幕运动中持观望态度。

另一方面,为了把“文明开化”、“教育救国”的思想传播到社会上去,他集中精力兴办私塾和著书立说,企图开辟一条拯救日本的新途径。

1866、1867和1870年,他先后出版《西洋事情》初、中、下三编。这是幕末时期他的代表作,内容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社会状况和理念作一般性的介绍;二是分别叙述了美国、荷兰、英国、俄国、法国的历史和现状。他著述这本书的动机在于把自己访问欧美时的感受和由此得到的新知识转达给更多的人,以唤起人们的觉醒。该书的销售量很大。福泽自己说:“该书的初编,经我手发行的部数就不下15万册。加上当时在京都大阪一带流行的伪版发行量,约有20万到25万部之多”。^③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流传得何等广泛。在出版《西洋事情》的同时,他还于1866年出版了《米福枪操法》卷一,1867年出版了《西洋导游》、《条约十一国

① 《福泽谕吉自传》,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5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③ 《福泽谕吉全集》,绪言,日本岩波书店。

记》和《西洋衣食住》。《西洋导游》是一本导游书，是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书。《条约十一国记》是介绍1858年到1867年间与日本缔结条约的各国概况。《西洋衣食住》是关于外国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的解说。

1867年10月27日，福泽谕吉所受到的“谨慎”处分被解除，他又到幕府去上班。在他受处分期间，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川幕府在倒幕浪潮风起云涌的形势下，已感到日暮穷途，末日来临，因而被迫抛出一种保留实权的策略。10月14日和24日，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先后两次奏请天皇，要求“奉还大政”，辞去将军之职。这样，德川家族今后还可以作为拥有八百万石领地的最大的“大名”(诸侯)继续生存下去。对此阴谋，倒幕派中有识之士一眼就看穿了，并要求天皇彻底否定幕府。结果明治天皇在1868年1月3日发布“王政复古”号令，宣告一切权力重新归天皇，废除将军之职，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①。倒幕势力集结于京都，开始建立明治政府。这是朝廷和倒幕力量向德川幕府提出的挑战。庆喜不甘心失败，组织幕府军向京都进攻。1868年阴历正月初三，以萨军、长军为主力的政府军与幕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地区激战了三天，天皇的政府军战胜了幕府军。这一次战役的胜利使幕府势力更加分崩离析。政府军乘胜追击，兵分三路直捣幕府老巢——江户城。1868年5月3日，江户“无血开城”(和平解放)。德川庆喜出奔，退隐于水户。在这场政权更替的风暴中，福泽没有卷入，而以“不参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对幕府本无一点留恋之意，赞成把它打倒，但无心帮助新政府。因此，当明治政府起用洋学家，招聘福泽谕吉到新政府任职时，他拒不应聘。此后屡次辞退任职，不愿为官。

① 命令德川庆喜再辞“内大臣”之职，并把德川家领地四百万中的一半交给朝廷，

从1863年起，福泽愈益把自己的精力倾注到办学塾上。自1858年办学到1862年末，塾生不太多。福泽作为创始人兼教师，中间两次出国，又从兰学转到英学，基础也不扎实。1863年，福泽才真正认真经营学塾，扩大学塾学舍，挑选本藩子弟带到江户，作为学塾的塾生，使门生逐渐增多。1864年有35人，1867年增加到80人。起初这是一个以九州地区出身的人为中心的学塾，后来逐渐发展成面向全日本的学塾。社会上对学塾的评价越来越好。1868年前后，政局的动荡自然也给学塾带来很大影响，塾生渐减，最少时只有18人。然而，福泽对此并没有丧失信心，他预感到新时机即将来临，便积极利用这个机会寻找新校址，以便修建新塾舍，扩大办学规模。1867年12月他买到一块空地，座落在新钱座。经过修建，1868年4月新塾舍竣工。学塾由铁炮洲搬迁到新钱座。学塾需要有个名字，而那年正是庆应四年，他便按当时的年号命名为庆应义塾。“义塾”这个词，当时在日本还是罕见的，含有英国Public School（公学）的意思，意在为国家的公共利益而设立。

塾舍搬迁后，学生渐增。福泽满怀雄心壮志，潜心治校，整顿塾风，制定塾规。塾规要求塾生品行端正，不借贷金银，不佩刀，不损坏图书。学塾还规定作息时间和卫生值日制度、食堂制度、课外活动制度，并制定了课程表。这些制度和规定今天看来不足为奇，而在当时的日本却是新鲜玩艺儿。发给全体塾生原著，由教师讲授，这是庆应义塾教学的特点。这些原著都是福泽从美国买回来的。学习科目有修身、经济、历史、地理、物理、算术和文章典故等。使用的课本相当于美国中学水平。学塾经过整顿，更富生机，因而博得了好评，加上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英学热，塾生倍增。因此，需要增建校舍。1871年1月至7月，福泽全家和庆应义塾一起搬到三田。后来他廉价买下了这块土地。1868年至1872年，庆应义塾愈办

愈完善。学校规模从 18 个学生扩大到 302 人。

在庆应义塾走上正轨、发展壮大的同时，福泽对著述活动也更加积极。从 1868 年到 1871 年他出版的著作有：《启蒙穷理图解》、《兵士怀中便览》、《洋兵明鉴》、《掌中万国一览》、《英国议事院谈》、《清英交际始末》、《世界国尽》和《启蒙学习之文》。此外，《来福枪操法》卷二、卷三和《西洋事情》的外编、二编也出版了。这些书以大量事实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政治、军事、历史、文化、科学技术、文物制度、风俗习惯等。这对刚从封建锁国制度下摆脱出来的日本人民而言，无疑起了积极的启蒙作用，使他们了解了世界，认清了日本的落后状况，找到了日本与西方的差距，并奋起向西方学习。

明治政府建立后，自上而下地实行了资本主义改革。1869 年“奉还版籍”。1871 年“废藩置县”，抛弃幕藩体制。接着改革等级身份制度，宣布士、农、工、商“四民平等”，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权；在经济上，改革土地制度，废除领主所有制，确认新兴地主和农民的土地私有权。通过官营示范或提供贷款等各种办法，鼓励私人办工厂。与此同时，实行“文明开化”政策，积极输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文明开化”这个名词是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外编（1867）一书中首先使用的，到 70 年代初被明治政府所接受，把它定为基本国策之一。因此，明治初期“文明开化”的风潮迅速传播开来，席卷全日本。从邮电、铁路、星期日休假制到西服、革履。无不体现“文明开化”，与之相反的东西均被斥之为“旧弊”。明治政府这种积极进取、大胆改革的精神，完全出乎福泽谕吉的意料之外，从而促使他改变了对新政府的看法。当他看到新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未有言而不实行者，未有行而不奏效者”，便感叹不已，拍手称快。特别是当他看到新政府“废藩置县”这一重大改革时，更是

高度赞赏新政府有胆有识，欢呼此乃“古今之一大盛举”，“目睹此盛举，虽死亦无憾矣”。^①

福泽谕吉生平有两大誓愿：一是个人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二是日本国民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②废藩置县的成功和废除封建门阀制度，使个人确实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了。这种改革方向完全符合他的心愿，因而他主张“乘势引导，进一步吸收西洋文明之新风，彻底唤醒全国民心，在东洋之一角建设新的文明国家”。^③从1872年起，福泽谕吉改变了从前的消极启蒙和袖手旁观态度，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热情，积极开展启蒙宣传和教育工作。他一方面著书立说和创办杂志，竭力宣传文明开化思想，推动明治政府继续进行改革；另一方面，继续整顿庆应义塾，培养资本主义近代化所需要的人材。

福泽从1872年起到70年代末撰写和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文章和著作，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课题，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作是《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

《劝学篇》是一本由17篇文章组成的著作，从1872年到1876年陆续出版。它以文明论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封建等级制和儒家思想，宣传个人独立、国家独立和“天赋人权”思想。他在撰写《劝学篇》之前，主要致力于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而《劝学篇》这本书并不是单纯地介绍，而是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发挥“天赋人权”思想，宣传自由平等学说，并根据社会契约论肯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号召日本国民舍身卫国，使日本社会赶上先进国家。此书表明福泽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已趋完善与成熟。

《文明论概略》是和《劝学篇》同等重要的启蒙性质的代表作。

① 《福泽谕吉全集》，日文版第6卷，第419页。

② 会田仓吉：《福泽谕吉》，吉川弘文馆，日文版，第178页。

③ 同上书，第179页。

这本书所表述的立场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推进日本的文明。如果说《劝学篇》以对儒家思想的猛烈抨击而成为感人肺腑的名著的话，与此相比较，《文明论概略》则是以剖析日本社会现状，指明社会发展前景的写作手法，具体地告诉日本人民何谓文明、文明的内容以及体现文明的制度是什么。他特别强调所谓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他希望通过宣传活动改变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把日本人由顺从的“臣民”改造培养成为“独立自主”的国民。

明治初期福泽谕吉除出版《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外，还陆续撰写了《童蒙教训》、《怪状女人》、《改历辨》、《记帐法》初编、《日本地图集》、《文字教育》、《会议辨》、《记帐法》二编、《学者安心论》、《分权论》、《民间经济录》（初编）等。此外他还创办了两种杂志——《民间杂志》和《家庭丛谈》。这些著作无不贯穿着启蒙精神。他所关心的问题和涉及的领域是非常广泛的。无怪有人说，福泽是一位具有百科全书派式的真知卓识的伟大启蒙思想家。^①《民间杂志》和《家庭丛谈》是由庆应义塾出版的启蒙性质杂志。前者面向农村，介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刊登农村来信，福泽从来信中了解农村的情况。后者是以家庭的父母、孩子为读者，向他们宣传精神文明。这两种杂志表现了福泽对民众启蒙教育的关心。

在福泽谕吉忙着撰写《劝学篇》的1873年（明治六年）夏天，明治政府的外交官、洋学家森有礼（1847—1889）发起成立“明六社”（因在明治六年成立，故用此名），并邀请福泽出任社长。福泽谢绝就任社长之职，但同意以成员身分参加。“明六社”于1874年制定“明六社章程”，并出版刊物《明六杂志》，其宗旨是：“会合同志，交换意见，增长知识”。^②这个宗旨清楚地标明它是启蒙性质的学术

① 参见鹿野政直：《福泽谕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②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中译本，第45—46页。

团体。但实际上,在《明六杂志》上发表的“明六社”社员的言论,却常常超出立社的宗旨之外,涉及了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明六社”的社员都是下级武士出身,富有汉学修养,并具有洋学知识,所以“堪称是日本的百科全书派”。^①他们十之八九是在明治政府中任职的官僚,或者虽然不是官僚,却也和明治政府的高级官僚有着个人间的密切交往。“明六社”的主要活动是召开演说会和发行刊物《明六杂志》。该杂志于1874年3月创刊,1875年停刊,共发行43期。“明六社”社员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百余篇,对于日本人的思想更新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明六社”的活动中,福泽谕吉虽然只作为一名成员参加活动,但实际上却起着精神领袖的作用,扮演着决策人的角色。

福泽谕吉在明治初期的教育活动和著述活动是卓有成效的。他的名著《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发表以后,他的名字便家喻户晓。19世纪70年代是福泽谕吉一生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也是他作为近代日本伟大思想家而出名的时期。他这一时期的著作是他思想体系中最有进步意义的篇章。

进入80年代后,福泽谕吉的政治思想开始变化,日益趋向保守,并带上民族扩张主义的色彩。这应从日本国内发生的自由民权运动谈起。

19世纪70年代中期,明治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公开化、明朗化。1874年1月,以参议员板垣退助等8人为主,向左院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要求停止“官僚专制”,“扩大人民的舆论公议”,给人民参政权。以此为开端,民选议院论日益高涨起来,不久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后,便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这

① 参见鹿野政直,《福泽谕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

给天皇专制的明治政府造成很大压力，并冲击着它的统治。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完全出乎福泽的意料之外，对此他感到非常不安。他既担心要求扩大民权的斗争会削弱日本的国力，又害怕这个运动也把自己牵连进去，因为他在1879年写过《国会论》的文章，提倡早日开设国会。虽然福泽本身并没有与明治政府为敌，但他的自由平等思想却对自由民权思想的勃兴和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他也被政府视为危险人物。为了“稳定社会风潮”，福泽在“民权论甚嚣尘上”之时，毫无顾忌地批评和指责自由民权运动，提出“国权优先”的主张。这就是他1881年7月发表的《时事小言》的主旨。在此之前，福泽虽然也谈过国权问题，但是那时他的逻辑是为了加强国权而必须推进国民的文明，也就是必须先扩大民权。他是民权论的拥护者。然而，此时他一反往昔的态度，在《时事小言》中提出的逻辑却是为了强化国权，必须停止扩大民权。他认为过分强调民权会导致国内斗争激化，现在应该停止这种斗争，团结国民力量，一致对外。他把这叫做“内安外竞”^①。写了《时事小言》后，福泽感到言犹未尽，又在1882年写了一篇《论藩阀寡人政府》，把他的扩张国权思想表述得更加清晰。他对国权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本来国权是意味着日本国的国家独立，摆脱不平等条约，确立与欧美列强平等的地位。这是福泽的原来思想，可现在他是在同欧美列强竞争亚洲，争夺政治霸权这个意义上来认识国权问题的。

福泽就是这样把民权和国权对立起来的，并在这个前提下提出“国权优先”和向国外扩张的主张。为了更明确、更详细地论述这一主张，他在1882年3月1日创办《时事新报》。1882年，福泽年满47岁，他的精力非常充沛，步入创作高峰。1879年东京设学士

① 鹿野政直：《福泽谕吉》，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第116—117页。